

多维文化视域中的鲁迅

——“中日视野下的鲁迅”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要

王初薇

由厦门大学、日本东北大学、北京鲁迅博物馆共同主办的“中日视野下的鲁迅”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9月24日至26日在厦门大学举行。来自日本东北大学（前身为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日本仙台鲁迅研究事务局、日本山形大学、日本福山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20余位日本的鲁迅研究学者，与我国海峡两岸各高校、研究机构的近60名专家学者一起，在鲁迅曾经工作过的厦门大学，围绕“中日视野下的鲁迅”、“鲁迅与日本”、“鲁迅与外国文学”、“鲁迅与中国新文化运动”、“鲁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性别视野下的鲁迅”等学术议题，通过主题发言的方式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日本驻广州总领馆总领事田尻和宏先生、鲁迅先生的孙子周令飞先生、藤野严九郎先生的孙子藤野幸弥先生作为嘉宾出席了会议。研讨会期间，还举办了鲁迅先生与藤野先生家族三代人的对话、日本东北大学的“鲁迅在仙台”图片展、日本话剧《远火——仙台的鲁迅》选段播映赏析等活动。

鲁迅的仙台时期

“仙台时期”被公认为是鲁迅生命中极其重要的阶段，也历来受到学界重视。早在1937年，日本学者就开始了鲁迅在仙台活动的调查和资料收集。多年来陆续发现的鲁迅的学业履历书、入学志愿书、日俄战争的幻灯底片、成绩表等珍贵资料，都在本次的“鲁迅在仙台”图片展中集中展出。本次会议的最大亮点之一，是来自日本仙台市的两个鲁迅研究专门机构——仙台鲁迅研究事务局、东北大学鲁迅研究课题组带来了厚重丰硕的研究成果。阿部兼也（日本东北大学）代表仙台鲁迅研究事务局首先对仙台的鲁迅研究史作了系统回顾。大村泉（日本东北大学）则代表日本东北大学鲁迅研究课题组介绍了课题组目前的研究动态。课题组成员坂井建雄（日本顺天堂大学）和窪俊一（日本东北大学）负责的是对鲁迅“解剖学笔记”的研究：坂井建雄从解剖学研究者的角度细致地考察了鲁迅

的“解剖学笔记”，发现鲁迅的部分笔记未提交藤野先生修改，鲁迅明显在幻灯片事件之前就已经失去对医学的热情，并据此推测寒假期间鲁迅在东京的经历可能是他弃医从文的真正动机；寇俊一指出，将东北大学医学部图书馆保存的当年鲁迅在校时的图书、藤野先生的藏书，及鲁迅同在仙台医专的同班同学的课堂笔记等资料，与鲁迅的笔记作比较，可以弄清当时鲁迅所接受的医学教育，了解当时鲁迅的学习状况。日本学人一贯的严谨、求实作风在此次研讨会得到了充分展现，受到与会学者的好评。

国内学者对“仙台时期”的观照主要是从宏观角度切入的，注重鲁迅仙台经历对他整个生命和思想体系的转折性影响，更倾向理论阐发。林份份（北京师范大学）探讨了鲁迅仙台叙述的文学伦理学与诗学问题，认为鲁迅对仙台经历的选择性叙述建构了一种关于启蒙文学者的“理想典型”。符杰祥（上海交通大学）从细读鲁迅留日时期的文本出发，认为他的“立人”主旨为现代化学说建立了合乎现代需要的精神根基。黄健（浙江大学）指出鲁迅在日本期间对尼采的接受是鲁迅思想的第二次重大飞跃，理性和非理性的交织使鲁迅的思想结构呈现出一种悖论式的紧张，也赋予其独创性和张力。尽管研究视角不同，但无论是日本学者的解读，还是中国学者的解读，都印证了张梦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中、日、韩三国鲁迅学界关于鲁迅精神本质形成“抗拒为奴”共识的归纳，他指出这是多年以来鲁迅学家们从人类整体发展进程出发的普适性共识，也是从“人学”的视角认识鲁迅所获得的真知。

比较研究与翻译研究

作为一位视野开阔并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现代作家，鲁迅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作家有着诸多的联系。对鲁迅进行比较文学研究，有利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增进各国之间的理解和包容。正如王富仁（汕头大学）在会议首场发言所指出的那样，从文化板块与文学研究相联系的角度看，中日的鲁迅研究加强交流合作对中日两国友好往来有非凡的意义。文学是具有更大超越性的文化，充分发展东亚各国之间的文学联系，无疑是加强东亚各民族人民之间的精神联系，缩小乃至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差异的最佳途径。此次会议在鲁迅的比较文学研究方面进行了多向度的开拓。

首先，鲁迅与世界各国作家的横向比较备受关注。张中良（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以往学界较少涉及的鲁迅与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关系进行了阐发，鲁迅受芥川龙之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历史小说的选题与家庭题材的小说对人性的深层挖掘上，譬如《补天》对后羿英雄形象的塑造与《弟兄》对多重人格的描写都明显有着芥川龙之介作品的风格。一直以来，由于语言方面交流的障碍，中波文学

比较研究较为薄弱。来自波兰的厦门大学博士生尤德良（Andrzej Juchniewicz）着重分析了波兰精神领袖密茨凯维奇的《先人祭》以及斯沃瓦茨基的《康拉德·华伦洛德》与鲁迅小说《铸剑》这三篇复仇作品的相似之处，借此论证波兰浪漫主义文学对鲁迅复仇思想的深刻影响。

关于鲁迅的翻译研究也是本次会议关注的焦点。从晚清到五四，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化、文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发言学者既有宏观的立论也有微观的剖析：张铁荣（南开大学）认为周氏兄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大胆实践与摸索建立中国自己的翻译体系、介绍诸多的东西方文学作品，在当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蒋童（首都师范大学）以林纾和周氏兄弟为视角，阐述了翻译与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的关系。付建舟（浙江师范大学）分别从七个方面论述了日本文学与文化元素对鲁迅前期翻译文学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作用甚至波及到整个中国现代文坛。

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

“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虽然是传统议题，但本次会议推陈出新，提出了不少独到见解。会议代表们普遍认为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他的思想更多地存在于文学中，鲁迅更应该作为一个文学家被阅读、认识和理解——鲁迅思想的“文学性”在此次交流中得到进一步的强调和重视。朱水涌（厦门大学）的发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厦门时期的鲁迅与顾颉刚的合作与分离，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政治和学术重新分化和重新组合的重要转折，表明20世纪20年代除主流提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外，对国学的认识与研究实践实际上颇为分歧。贺仲明（南京师范大学）指出以往学术界对鲁迅的认识主要侧重于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文学方面关注得不够充分，提倡回到“文学的鲁迅”。

部分学者对鲁迅的文学作品进行了深入的文本解析。刘卫国（中山大学）将鲁迅作品的地理空间划分为两种形式：居室空间和旷野空间，鲁迅安排作品中的人物在两类不同空间中产生不同的心理感受，是想借助这两类空间形式讲述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启蒙主题。俞兆平（厦门大学）对《阿Q正传》作了再阐释，他认为鲁迅对阿Q的态度不是“怒其不争”而是“惧怕其争”，这体现着鲁迅对20世纪初中国“个人”与“众数”对立矛盾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张业松（复旦大学）论述了《故事新编》与鲁迅文学的“为己”属性，即具有更多“为自己”的成分，是了解鲁迅后期审美态度和政治立场的重要文本，也是认识鲁迅文学的一般属性的重要例证。厦门大学博士生王初薇则从鲁迅笔下中国“鬼”与西方“魔”相契合的角度，论述了鲁迅早期的“立人”文艺观。

性别视野下的鲁迅

伴随着“个人”意识的觉醒，“启蒙”上升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主题，然而“女性”的发现却长期隐没于“人”的发现之后。此次在鲁迅研究的研讨会上为性别研究单独开设议题可谓一次创举。发言的学者从性别研究角度多层次发掘其与鲁迅的关系，给与会人员带来了精神冲击与思考空间的拓张。杨联芬（北京师范大学）以胡适的《终身大事》和鲁迅的《伤逝》两个具体文本为比照，提出了五四女性解放叙述的两个角度——个人主义与性别权力。她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个人主义”的提倡者之所以对“人”的问题的体认和思索还不够深入，是因为对性别问题的思索不够深刻，没有将性别权力的关系纳入到文化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来。王宇（厦门大学）从鲁迅的小说中读出了启蒙叙境中性爱关系域的缺失，认为这是鲁迅比同时代人都更能体味启蒙之虚妄的体现。

鲁迅的家庭生活及情感生活同样引人注目。刘思谦（河南大学）首先比较了鲁迅和胡适这两位五四时期引领“人的发现”与“女性的发现”思潮的文学家和思想家自身对包办婚姻的态度：他们相同的是对自己屈从包办婚姻的解释，不同的是婚姻之后与伴侣的感情以及婚姻之外与异性的关系。徐学（厦门大学）则论述了鲁迅的性爱观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他认为鲁迅接受新思潮后性解放的观念与前半生性压抑的现实造成了冲突，加剧了他的性苦闷以及对性爱的敏锐感触。因此，挖掘并阐述鲁迅的性爱观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能更好地透视作家背后的创作动机。

学者们对鲁迅与当代女性文学的关系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廖冬梅（广东嘉应学院）认为鲁迅作品中“立人”的逻辑起点、边缘化的写作立场以及反二元对立的主体间性思维、对性别文化的检视和反思等，都给当代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的女性小说叙事创作以很大的影响。沈红芳（河南大学）以张洁、铁凝、王安忆等当代作家对当今女性无法平衡家庭与事业之关系的叙写为例，提出这是“娜拉走后怎样”问题历经一个世纪仍然悬而未决的回响。

最后，王富仁先生在闭幕式上做了学术总结。他高度评价了此次日本学者关于“鲁迅在仙台”研究的系列发言，指出这为今后的鲁迅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此次会议蕴育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新的发展方向：过去三十年的研究主要是用思想理性的研究来代替政治理性的研究，但当我们用理性的标准来衡量鲁迅时，鲁迅的价值被湮没了；我们不能用理性概念来衡量作家，而鲁迅首先是作为一位文学家被人们所铭记的。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从文学的角度很好地研究了鲁迅与中日两国文化的关系，增进了中日学者的交流，于鲁迅学术研究与中日文化交流都将意义深远，为中日文化和谐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王初薇 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邮编 361005]